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杨晓宇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摘要

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城乡倒置的严峻态势, 已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面对的结构现实。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扭转的背景下,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基础养老金保障水平偏低、服务供给结构性短缺三重压力叠加, 使农村养老陷入“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的双重困境。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 认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应置于劳动力再生产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统一中加以把握。研究提出, 应以互助养老为突破口激活农村内生资源, 以制度并轨促进城乡养老保障权益平等, 以要素下沉夯实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 推动农村养老从“生存型保障”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在破解老龄化难题中释放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农村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障体系, 互助养老, 高质量发展

Research on Rural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Security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Xiaoyu Y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23,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Abstract

Rural population aging presents a severe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rapid speed, large scale, and an urban-rural age structure inversion, making it a structural reality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n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ersistently unbroken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s, the triple pressures—the continuous weakening of rural family care functions, the low level of basic pension security, and the structural shortage of service supply—have trapped rural elderly care in a dual dilemma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and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eady”. Drawing o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grasped within the organic unity of labor force reproduction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mutual aid for the elderly should be taken as a breakthrough to activate endogenous rural resources;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o achieve equal urban-rural pens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resources should be channeled downward to consolidate a three-tier (county, township, village) service network. These measures aim to prop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from a “survival-oriented security” model to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thereby unlocking new momentu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le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aging.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Population Aging, Elderly Security System, Mutual-Assistance Elderly Ca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截至 2025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约 3.2 亿人,占总人口的 22.0% [1]。其中,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尤为严峻——全国农村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 1.2 亿,占农村总人口近四分之一,远高于城镇水平 [2]。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城乡倒置”格局仍在加深: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导致农村人口“空心化”,家庭养老的人力基础不断被削弱;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薄弱、养老资源配置长期滞后,使农村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最难啃的“硬骨头”。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鼓励开展村级互助性养老服务”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将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划分为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并明确了分级建设的基本要求、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和在县域统筹下中心带站点进家庭的衔接方式 [4]。这标志着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已上升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在于:如何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构建符合农村实际的养老保障体系?如何使养老服务从“生存保障”迈向“高质量发展”?这既是重大的民生课题,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回答的理论命题。

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农村养老问题: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是劳动者个人的事务,更是社会总再生产的关键环节。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城乡关系演变规律,认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将消失,城乡关系会由分离、对立走向融合 [5]。在城

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惯性下，农村老年群体曾以“剪刀差”等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却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因此，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意义，更蕴含着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城乡融合的深层逻辑。本文将在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特征与挑战的基础上，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2.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特征与现实挑战

2.1. “城乡倒置”与“空心化”双重叠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近乎翻番，到 2020 年超过 1.2 亿人。人口老龄化率从 7.8% 迅速提高到 23.8%，城乡人口老龄化率的差距从 0.4 个百分点扩大至 8.3 个百分点[6]。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流动的单向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镇转移，而老年人则留守乡村。这是一种典型的人口筛选机制——城镇获得了年轻劳动力，农村则承担了养老负担。

与此同时，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空心化”态势。为改善家庭生活质量、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选择前往大城市务工谋生。这一现象导致大量青壮年长期脱离农村的生产生活场景，却仍隶属于农村家庭，使得留守老人逐渐成为许多村庄的常住主体，部分村庄甚至出现了“十户九空”的空心化景象。更值得警惕的是，农村 0~4 岁人口占全国比重从 2000 年的 67.9% 下降至 2020 年的 36% [6]，这一数据清晰传递出关键信号：农村不仅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灾区”，其人口再生产的内生活力也在持续衰减。

这种结构性失衡，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养老的原有格局。传统农村养老长期依托“土地保障 + 家庭赡养”的双重支撑：土地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来源，子女承担日常照料与精神慰藉，二者相互配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劳动力外流成为常态，这一稳定模式被逐渐打破。尽管子女可通过汇款继续提供经济支持，但日常照护、情感陪伴等需要近距离在场的养老服务，却难以跨越时空实现有效供给。在此背景下，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而城市相应指标变化甚微。农村地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现实困境，正是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与社会化养老供给严重不足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2.2. 养老金保障水平与需求之间的落差

当前农村养老保障最突出的短板，是基础养老金水平偏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从 2009 年的每人每月 55 元增至 2026 年的 163 元。单看增长速度，年均涨幅达 6.2% [6]，似乎并不算慢。但如果放在物价上涨、医疗费用攀升的背景下审视，就会发现问题严重性。有基层代表坦言：“一次到市区医院看病的路费，就可能远远超过一个月的补贴。”这并非夸张之辞——对于农村老人而言，163 元仅能维持最基本的食品支出，一旦涉及医疗、康复、照护等需求，便显得捉襟见肘。

更深层的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城镇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中，社会保障收入占 68%，而在农村老年人中，这一比例仅为 42.7% [6]。这意味着，更多农村老年人需要依靠自己种地或打零工维持生计。城乡老年人年均收入差距达 3.4 倍，中位数差距更是扩大到 5.1 倍[6]。如果说绝对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城乡养老金差距则更具冲击力：城乡居民养老金月均约 246 元，城镇职工约 3500 元，两者相差 13 倍[6]。这种差距已经超出了“城乡差异”可以解释的范围，而带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

从历史视角审视，这种差距的形成与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密切相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提取积累，用于支持工业发展。农村劳动力为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却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推行的“五保”制度，仅覆盖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群体，广大普通农村老人未能被纳入制度化保障体系。从马克思主义视角

看，这实质上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分担问题——农村劳动力为城市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劳动，但当这些劳动力年老体衰、退出生产领域时，其再生产的成本却主要由农村自身承担。

2.3. 养老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短缺

与城镇相比，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设施不足”三大瓶颈的叠加制约。从硬件看，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低，许多乡镇敬老院仍停留在“特困供养”的兜底功能上，尚未转型为辐射周边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从软件看，专业护理人才极度匮乏，农村养老机构普遍面临“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困境。从服务形态看，现有供给以基本生活照料为主，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更高层次的服务严重缺位。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养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农村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需要专业照护的老年人口日益增多。这一群体的照护需求具有长期性与专业性特征，仅依靠传统家庭赡养与邻里互助模式已难以实现有效供给。与此同时，城乡老年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农村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明显低于城镇老年人，且二者之间的健康差异呈逐步扩大趋势。多数农村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相当一部分群体在患病后未能及时接受正规医疗服务，而是采取自行购药或消极等待等方式应对。这一状况既受制于经济支付能力，也与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足、服务可及性不高等现实因素密切相关。

相较于生理健康问题，长期精神孤独成为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更为突出的困境。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外出务工子女与留守老年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较为薄弱，沟通频次有限、交流内容浅表化，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情感支持。当前农村空巢老年人比例持续攀升，空巢化已成为农村人口结构的重要特征。当老年人逐步丧失劳动能力，其在家庭中的角色从生产支撑者转向生活依赖者，由此引发的孤独感、价值失落感与自我否定情绪，深刻影响其晚年生活质量。物质层面的生活困境可通过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得到一定缓解，而精神层面的缺失与情感需求，则需要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的社会支持体系予以回应和保障。

3. 乡村振兴与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理论逻辑

3.1. 劳动再生产与社会保障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养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劳动者不仅需要获得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还需要获得赡养家庭、抚育后代的资源。然而，劳动力的价值“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其具体构成取决于特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制度安排。这意味着，养老保障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而不断提高。

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它贯穿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入剖析和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分析的革命思想发展中[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揭示其社会保障制度的虚伪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从而保证资本积累的持续。无产阶级改善生活状况、摆脱受剥削地位的根本出路，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7]。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仍有重要启示：社会保障不应仅仅是维持生存的“兜底”机制，而应成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安排。

从这一视角审视农村养老问题，可以得出两点重要启示。其一，养老保障本质上是劳动力再生产社

会化的体现。当家庭无法独立承担赡养功能时，社会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介入，以确保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正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基本逻辑——将个体生命周期的风险分散到整个社会，将家庭内部的代际赡养扩展为社会的代际契约。其二，城乡养老保障差距的形成，与历史上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角度揭示了城乡关系演变规律，认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将消失，城乡关系会由分离、对立走向融合[7]。在这一进程中，对农村老年群体进行制度性补偿，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在我国现阶段，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快速转型，社会各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弱势群体、特殊群体增多。又由于我国二元社会的发展格局，农村社会保障标准低、农民无能力参保等问题突出。在马克思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等社会福利思想的启迪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会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

3.2. 乡村振兴与养老保障的内在统一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破解农村养老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空间。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8]。这一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也揭示了乡村振兴与农村养老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目标导向看，乡村振兴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核心追求。老年群体既是乡村振兴进程的亲历者与参与者，更是长期投身乡村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他们在青壮年时期为乡村发展辛勤耕耘，步入晚年理应平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保障农村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应有之义。倘若乡村振兴仅惠及年轻群体，而将老年群体置于发展视野之外，这样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农村养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处于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既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亦是衡量共同富裕成效的核心民生指标[8]。

从路径选择看，乡村振兴强调激活农村内生动力，这与农村养老的“就地解决”逻辑高度契合。养老服务不仅是需要投入的事业，更是可以创造就业、激活资源的产业。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实践表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与乡村振兴可以形成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养老服务岗位为留守妇女、低龄老人提供了本土就业机会，互助养老模式激活了村庄的社会资本，适老化改造带动了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将养老服务需求转化为本土就业机会，可以推动乡村振兴与养老服务的双向赋能。这意味着，农村养老不应被视为单纯的“负担”，而应被理解为乡村振兴可以依托的战略资源。

从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既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战略，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兼顾不同群体的发展需要。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核心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乡村全面振兴则以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不仅回应了城乡居民对公平养老的现实需求，更是连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两大战略的重要纽带。

4. 典型案例研究：桐城与涟水的互助养老实践

4.1. 安徽省桐城市“银龄伙伴计划”

桐城市位于安徽省中部，辖12个镇、3个街道，是典型的农业县市。2024年6月，桐城市被安徽省民政厅确定为第二批农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县(市)。以此为契机，该市系统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着力破解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资源分散等难题[9]。

桐城市的实践探索可概括为“三位一体”的互助养老模式，即“服务阵地 + 服务队伍 + 服务机制”的有机结合。

一是服务阵地建设。桐城市依托农村幸福院，整合村卫生室、文化活动中心等服务设施资源，形成“日间照料 + 健康服务 + 文化娱乐”三位一体的服务阵地。在范岗镇高岗村、文昌街道汪洋村、金神镇杨塘村和塘桥村 4 个试点村打造互助养老服务站点，配备专业社工和志愿服务团队。村“两委”定期组织“需求调研会”，形成 150 余名老人的精准需求表，推出“居家照料”“日常巡访”“资源链接”等特色服务^[10]。

二是服务机制创新。桐城市以“老人实际需求”为导向，常态化组织义诊、义剪、健康讲座等活动。依托村级信用超市，将志愿者服务时长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等物资奖励，对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在村社公示表彰、颁发荣誉证书，有效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三是服务机制创新。桐城市以“老人实际需求”为导向，常态化组织义诊、义剪、健康讲座等活动。依托村级信用超市，将志愿者服务时长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等物资奖励，对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在村社公示表彰、颁发荣誉证书，有效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针对山区养老资源匮乏、老人照料难的问题，青草镇铜锣村率先探索集中式互助养老路径。该村整合利用危房改造专项资金打造农村互助养老集中安置点，实现“小户型、集中式、低成本”建设模式。由铜锣村设立公益性岗位，聘请熟悉村情的村民负责安置点日常管理，联动村卫生室每月驻点义诊，通过引导入住老人在日常生活中“以老助老”，形成内部互助氛围。

桐城市的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整合爱心企业岗位与村级公益岗位，为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老人提供护林员、保洁员等岗位。桐城实践的启示在于：互助养老需要服务阵地、服务队伍、服务机制三者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山区集中安置点的探索，为破解偏远农村养老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4.2. 江苏省涟水县保滩街道周集村

涟水县位于江苏省淮安市。2024 年下半年，涟水县在保滩街道周集村、红窑镇刘桥村率先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试点工作。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宣传，全县第一支农村互助养老志愿服务队应运而生，有效破解农村老人“进养老机构付不起、舍不得、拉不下脸”等难题^[11]。

周集村 60 岁以上老人达 585 人，占常住人口近 50%。村委是互助养老志愿服务队的主要负责人，队员涵盖网格员、帮办员、留守妇女、健康低龄老人、志愿者等。

一是精准摸排与结对帮扶。涟水县深入周集村，精准摸排 60 岁以上老人的年龄结构、健康状况、日常生活、住址分布、所需所求等情况，精细梳理干群和老人们关于开展互助式养老的意见和建议。服务队常态化为村内留守、空巢、孤寡及有需求的困难老人开展日常照料、走访巡防、就医取药、精神慰藉等服务。

二是积分激励机制设计。周集村创新推出“互助养老队伍培训”“邻里互助 + 积分奖励”运行机制，志愿者通过服务积累积分，年底可以换取牛奶、衣服等物质奖励。村民王国英就因为热心助老，被淮安市社工部邀请参加“学雷锋”志愿活动启动仪式。

三是多元服务内容。服务队成员分工明确：独居老人郑培考患有心脏病，邻居郑九超主动承担照料责任；留守老人周介宇因子女外出务工无人照料，邻居周介茂、周介世兄弟俩为他解决日常需求；村会计周蒙蒙节假日给老人讲评书故事。村里卫生室、理发店、保洁员等社会力量还定期为老人免费服务。

自成立以来，周集村互助养老服务队由当初的 10 多名增加到 150 多名，“零距离”服务老人千余人次，帮老人们解决难题 580 余件，被老人们称为“及时雨”“爱心队”^[12]。涟水县计划将周集村的成功做法推广到红窑镇刘桥村，争取三年内实现全县农村社区困难、留守、独居老人互助养老全覆盖。

5. 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激励机制设计

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关键在于构建回应多元动机的复合激励机制。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有效的制度设计应包含“五层激励”的有机组合：积分兑换机制将服务时长量化为可兑换生活用品的积分，提供即时正向反馈；“时间银行”机制实现服务时间的跨期存储与兑换，解决代际公平问题；荣誉激励机制通过公开表彰、信用评级满足志愿者的社会认同需求；小额补贴机制为长期参与者提供适度的经济补偿，增强参与持续性；岗位开发机制将互助服务转化为公益性岗位，实现“服务者”与“就业者”的身份统一。五层机制协同作用，分别回应物质利益驱动、社会认同需求与利他主义动机，形成“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并重”的制度架构，确保互助养老从“自发互助”走向“可持续运行”。

6.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6.1. 激活内生资源：互助养老的深化与拓展

互助养老是近年来农村养老服务领域最具活力的创新方向，也是破解资源约束的重要突破口。其核心逻辑在于：挖掘农村潜在的“本土资源”——低龄健康老人、留守妇女、闲置房屋、熟人社会网络——以较低成本提供可持续的养老服务。

从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来看，互助养老已经形成了多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安庆桐城市以“银龄伙伴计划”为抓手，扎实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构建起“政府引导、村社主导、多方参与、互助共享”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13]。江苏涟水周集村则成立互助养老志愿服务队，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以积分激励提升服务持续性，既满足老人日常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13]。

从实践层面看，互助养老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组织载体建设。互助养老不能停留在自发状态，需要有明确的组织依托。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互助养老服务站，既可以整合现有资源，也便于与乡镇、县级养老服务体系对接。二是服务队伍建设。农村留守妇女是互助养老的重要人力资源，她们既有时间精力，也具备照护经验。针对这一群体开展系统培训，给予适度的经济补贴和职业认可，可以有效激发其参与热情。三是激励机制设计。互助养老需要可持续的动力机制。将志愿服务时长量化为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用品或未来养老服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这种“时间银行”式的机制，既尊重了市场交换的逻辑，又保留了邻里互助的温度。

互助养老的深层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养老服务，更在于激活村庄的社会资本。在人口流动常态化、村庄共同体日渐松散的背景下，互助养老为村民创造了重新连接的契机。它让人们重新意识到，村庄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情感共同体。

6.2. 弥补制度短板：从“生存保障”迈向“高质量发展”

当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一个根本性缺陷是“保生存有余、促发展不足”。163元的基础养老金仅能维持最基本的食品支出，无法覆盖医疗、康复、精神文化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要推动农村养老从“生存型保障”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需要在制度层面作出系统性调整。

具体而言，需稳步提升基础养老金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并向高龄老人倾斜，探索政府、集体、社会等多元筹资机制及相关金融产品创新，完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并推动其全面铺开、强化乡镇卫生院照护能力，同时强化生命全周期观教育，通过立法完善农村养老顶层设计，明确养老服务标准与规范，为农村养老事业长远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6.3. 优化资源配置：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农村养老资源配置提供了清晰的

制度框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网络的建设要求：总的要求是在县(区)范围内，建设以县级平台为龙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为枢纽，村(社区)服务设施站点为节点，上下贯通、有效衔接、合理分工的三级服务网络，实现县(区)范围内养老服务资源科学配置、有序流动和广泛覆盖，让老年人能够就近享受到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从功能分工看，县级依托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综合管理平台，发挥示范、指导等作用；乡镇将现有养老机构改扩建为区域服务中心，提供专业照护并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村(社区)发展嵌入式和互助型养老设施，强化基础服务能力。按照《意见》部署，养老服务网络到 2029 年将基本建成，到 2035 年将更加健全。

资源整合的另一重要方向是盘活农村闲置资产[14]。农业农村部明确提出，支持村集体依法盘活闲置农房、校舍、卫生院等资产，发展互助养老服务，综合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动室、村图书室等，进一步拓展村级养老服务场所空间。这种以存量换增量的思路，值得在更大范围推广。

6.4. 技术赋能与人才培育：提升服务供给能力

智慧养老是破解农村养老服务资源分散、需求多样化的关键抓手[15]。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实现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和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14]。当然，智慧养老在农村的推广必须正视“数字鸿沟”问题——需要通过“数字代理人”或亲属协助等方式，帮助老年人跨越技术门槛。

人才是农村养老服务的核心资源，破解人才匮乏问题需坚持“引培结合、本土为主”。国家层面通过技工院校培养专业养老技能人才、完善相关职业分类与标准、培育养老服务劳务品牌带动就业等方式强化人才支撑；地方则注重激活本土人力资源。同时，各地聚焦特殊困难老人，开展探访关爱与多元化助老服务，并借鉴德安县“全域养老”改革经验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通过盘活农村闲置资产拓展服务空间，形成可持续的农村养老服务发展路径。

7. 结语

农村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面对的结构现实，也是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成色的重要标尺。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扭转的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既面临家庭功能弱化、资源供给短缺等多重压力，也蕴含着激活内生资源、重塑城乡关系的历史机遇[15]。

本文分析表明，破解农村养老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将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框架中统筹谋划。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既是对农村老年人历史贡献的制度性补偿，也是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走向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从更宏阔的视野看，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关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成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色，关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城乡从分离、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正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逐步显现。唯有将养老事业融入乡村全面振兴的全过程，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图景，也才能在破解老龄化难题中释放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参考文献

- [1] 广东省民政厅. 代表建议构建农村老人互助照护体系, 民政部答复: 将互助养老纳入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推进范围[EB/OL]. https://smzt.gd.gov.cn/mzxx/qgmz/content/post_4861591.html, 2026-03-03.
- [2] 周超. 为农村养老补短板锻长板, 让夕阳更暖、民心更安[EB/OL]. 湖南人大融媒体中心. <https://www.hnrmzy.com/content/646047/98/15745544.html>, 2026-03-06.
- [3] 杜鹏, 芦千文, 蔡键, 等. 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多元化发展[N]. 农民日报, 2025-07-31(08).

-
- [4] 湖南省人民政府. 着力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EB/OL].
http://hunan.gov.cn/zqt/zcjd/mtjd/202501/t20250113_33562255.html, 2025-01-10.
- [5] 刘雪梅. 注重策略方法统筹“城”与“乡”[N]. 经济日报, 2025-12-19(11).
- [6] 刘守英, 等. 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农村养老问题——基本事实与解决路径[EB/OL]. 澎湃新闻.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189801, 2025-12-19.
- [7] 邓鸿丽. 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及其对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启示[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国家图书馆, 2016.
- [8] 袁丽文.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养老现实困境与策略探讨[J]. 江西农业, 2025(14): 143-145.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xnye202514047>
- [9] 安庆市民政局. 桐城市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EB/OL].
<https://mzj.aqing.gov.cn/mzzw/xqcz/2004145983.html>, 2025-09-16.
- [10] 中安在线. 安徽桐城: “银龄伙伴”共绘互助新景[EB/OL].
http://ah.anhuinews.com/ahqmt/202510/t20251027_8871670.html, 2025-10-27.
- [11] 涟水县人民政府. 涟水县: 创新路径“应老盼、护老心、解老难”[EB/OL].
http://www.lianshui.gov.cn/col/888_535372/art/m/17434368/17452002495583nGraszw.html, 2025-04-21.
- [12] 安徽省民政厅. 安庆桐城市: 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EB/OL].
<https://mz.ah.gov.cn/xwzx/sxdt/123084031.html>, 2025-09-29.
- [13] 王菲. 农村养老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26(9): 17-20.
- [14] 左迎迎.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困境及路径[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6, 37(2): 193-196.
- [15] 屈振辉, 彭利娜, 谭乐坤.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的需求、模式与优化路径[J].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学报, 2026, 38(1): 66-75.